

玄武门之变与秦王登位
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是争夺 还是历史的选择

□玄武门之变与秦王登位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晨，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并马而行，入参父皇李渊。他们已经从张婕妤那里得知，秦王李世民密奏他二人淫乱后宫，并加害秦王，父皇今日正要鞫问此事，因此内心里都忐忑不安。他们虽然将京城的作战力量作了部署，但事情的复杂性和严重程度他们并没有充分估计到。一场杀身之祸正一步步向他们逼近。他们不知道，秦王劾奏太子、齐王是一计，而此计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希望高祖鞫问详实，加以处罚，真正的目的是利用高祖召问，引蛇出洞，杀太子而夺位。这是计中之计。

高祖李渊已召裴寂、陈叔达、萧瑀等大臣等待建成兄弟。

秦王李世民却在他们必经的玄武门埋下了伏兵。

这是一场险恶的政治阴谋，建成、元吉正一步步走入陷阱。

建成、元吉入玄武门，至临湖殿，发觉有变，立刻勒马转辔，想各回宫府。就在这时，李世民边喊边纵马追来。元吉拈弓搭箭，射向世民，但由于仓皇失措，连续三次没有把弓拉满便射了出去，自然不能命中目标。李世民却沉着镇静，一箭射死了

建成。秦王府骁将尉迟敬德率七十名精骑接着赶来，又把李元吉射下马来。不料，秦王的马受惊奔入路边树丛，李世民为树枝所挂，落马不能站起。受伤的元吉迅速赶来，夺弓想扼死世民。尉迟敬德跃马赶到，大声喝斥，元吉逃命要紧，松手向武德殿狂奔，被紧追不舍的尉迟敬德射死。

建成部将冯立与薛万彻、谢叔方等率东宫、齐王府精兵二千赶到，但世民部将张公瑾闭关拒之。玄武门守将敬君弘和吕世衡都是秦王亲党，挺身而出，为宫府兵所杀。薛万彻见不能冲进玄武门，扬言要杀向秦王府。秦王部下十分惶惧。在这紧要关头，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之首以示众人。宫府兵顿时溃散，四处奔逃。冯立、谢叔方、薛万彻也随乱军亡匿。

皇帝李渊正在太极宫海池泛舟，看来他并没有把建成、元吉的事看得多么严重。世民兄弟失和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次世民弹奏太子、齐王，他认为不过又是一次兄弟之间的纠纷。尉迟敬德突然闯入宫来，擐甲持矛，径直来到李渊身边。他说太子、齐王作乱，秦王举兵诛之，宫府兵还在玄武门激战。他奉秦王之命，前来保卫皇帝的安全。李渊明白自己的处境，立刻接受尉迟敬德的请求，亲手写下一道御旨，令诸军皆受秦王指挥。秦王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立刻出东阁门宣布了这道命令，一场

兵乱方才安定下来。

这场宫门喋血，史称“玄武门之变”。事变的结果是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丧生，皇帝李渊退位，秦王李世民三天后被立为太子，两个月后即位为皇帝。诚如史家所评价的，这场政变的性质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纯属皇室内部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兄弟相残和子父相煎。在这样的斗争中，任何一方心慈手软，在关键时刻犹豫徘徊，错失良机或者权术智谋稍逊一筹，都会给自己造成灭顶之灾。李世民对付父皇、兄弟，像过去对付其他大敌一样，表现了他的刚决果断和权谋心机，使他成为这场斗争的胜利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李世民和李建成的矛盾由来已久。李建成是李渊的长子，在反隋建唐的斗争中立下不少战功。按照立嫡以长的传统，李建成被立为太子，继承皇位是当然的事情。当李氏父子建立了唐朝时，他被名正言顺地立为太子。但与此同时，他的弟弟、秦王李世民在推翻亡隋、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建立了远远超过他的功业。嗣君不征也是惯例，这使李建成失去许多立功扬名的机会。相反，李世民打过许多大仗、硬仗，他指挥的一些重大战役对唐王朝的建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使他赢得了声名。其功之高，父亲李渊以为“古官号不足以称，乃加号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之上。从

心理上说，由建成为储君，继皇位，他必然不满意，不服气。“聪明英武，有大志”、不甘居人下的李世民必然由感到委屈进而产生争夺皇位的野心。他手下那些跟随他出生入死的谋士勇将也会产生建成执政功高不赏的忧虑，必然鼓动他争夺最高统治权。李建成则因功不及秦王，仅以长子身份而居嗣君之位，不能不对秦王生嫉妒和戒备之心。事实上，秦王的功业声名确实对太子形成了威胁。

兄弟之间心理上的隔阂对峙可能从李建成被立为世子、太子时即已产生。但那时建成与世民功业相当，天下纷争，李氏父子倾全力与群雄角逐，两人的争强较胜心态还处于朦胧潜伏状态。后来，建成为太子，多留守京都，李世民则多出征应敌。及至李世民先后消灭薛举父子、刘武周、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击败刘黑闥，两人之间功名高低便越来越拉开了距离，心理上的距离也越拉越大，骨肉亲情逐渐为权利之争所代替。经过几年的酝酿，到武德五年（622年），兄弟之间的矛盾便表面化、公开化了。这时唐王朝的统一战争已经结束，新兴政权已经稳固，到了分享和争夺胜利果实的时候了。

建成、世民之外，还有一个弟弟李元吉，也有夺位野心。但他既没有建成作为长子继承皇位的合法地位，也没有世民劳苦功高声名远播的优势。但

他有自己的打算。他考虑的是建成和世民哪一个更容易对付，将来能取而代之。建成性格敦厚，为人较秦王懦弱，他想支持建成巩固其太子地位，杀秦王而除对手，伺机为变。当他的部下说他的名合成一个“唐”字，“终主唐祀”时，他就高兴地说：“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因此他与建成合谋，一起陷害世民。

武德五年，统一天下的战争刚刚结束，李氏宗室内部的争斗便热闹起来。兄弟三人都培植党羽，私树威名。当时以皇帝李渊的名义发出的文件称为诏敕，以太子建成的名义发出的文件称为“令”，以秦王、齐王的名义发出的文件称为“教”。李渊父子都向朝廷各部发号施令。“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敕并行，有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这些来自不同方向的文件相互冲突，不管是朝廷公务，还是官府私事，都要求官府承办。执事的官员都不敢怠慢，而当不能兼顾时，则只好根据得到文件的先后进行处理。这真成了名符其实的“家天下”。元代历史学家胡三省对唐初政治的这种混乱局面评价道：“使唐之政终于如此，亡隋之续耳。”太子党深惧秦王的威势，因此积极协助李建成树立声望，以与秦王抗衡。太子中允王珪、太子洗马魏徵李建成出征刘黑闥残部时就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

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闥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把军事上的出征和太子地位的巩固联系起来，征刘黑闥却是为了对付秦王李世民，说明秦王的威名对太子地位形成的威胁有多大。这在太子党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唐高祖既不能违背传统废太子，也不忍心贬黜秦王，这就导致了秦王与太子的长期较量。即便从武德五年算起，这场明争暗斗也延续了四年之久。至武德九年，终于酿成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局面。曾有人诟病李渊，以为玄武门之变的发生，是他优柔寡断所造成的。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替李渊着想，作为人君，又为人父，他确有为难之处。

高祖曾对李世民说：“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说明他并没有废建成而另立世民的打算。史书上有不少有关李渊企图改立世民为太子的记载，根据当时的情势，都不可信据。那不过是李世民夺位成功后，他自己及属下为他篡位夺权制造的合法根据。高祖既然决心以建成为后嗣，为了避免身后兄弟相争，就必须加强太子的地位，削弱秦王的势力。高祖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武德九年（626年），他听信建成、元吉之言，将秦王心腹程知节、房玄龄、杜如晦等陆续调出秦府，秦府上

下都感到不安。程知节告诉李世民说：“大王股肱羽翼尽矣，身何能久？”适逢突厥寇边，李建成举荐李元吉督军北征，李元吉又乘机请调秦府名将程知节、秦叔宝、尉迟敬德、段志玄等一起出征，并简选秦府精锐之士加强军力。李建成与李元吉密谋，定下利用元吉出征饯行的机会杀死李世民，由李元吉在军中坑杀秦府诸将的毒计。

在太子和秦王的斗争中，双方都注意收买对方爪牙作为内线。太子率更丞王埵就是李世民在东宫的一条内线。他把这一重要情况泄露给了秦王。

这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形势迫使李世民及其党羽下定了发动兵变夺位的决心。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叙述的那场生死搏斗。玄武门从此在唐史中具有了异乎寻常的意义。

李世民也知道“骨肉相残，古今大恶”，但他采取这种非常手段，是由双方实力对比和他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李世民虽功盖天下，但在与李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却在不少方面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相对来说，李建成则具有不少优势。

李建成为长子，立为太子名正言顺，而且已久居储君之位，无故不可能有废立之事。传统支配着人们的观念，而观念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力量支持着建成，使他不需采取非常手段，只要按部就班，就能水到渠成地继承皇位。一旦高祖晏

驾，大权在握，那政敌李世民就成为俎上肉。而对李世民来说，高祖生前兄弟相安无事，就意味着将来为人所制。这就是他被动的一面。

在宰相中，裴寂、封德彝支持建成，萧瑀、陈叔达倾向世民。但裴寂居首相地位，是高祖最宠信的大臣。因此在争取皇帝和大臣的支持方面，建成具有优势。

李建成和李世民都努力争取高祖妃嫔的支持，以求获得“内助”。但建成是太子，妃嫔们都认为他是李渊的法定继承人，都设法巴结他以图高祖去世后能得到优待。加之建成久居皇宫，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她们，长期以来又一直在极力拉拢收买，因此她们大多支持建成，在高祖面前说建成的好话，而诋毁世民。

最重要的是皇帝李渊倾向建成。李渊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他的思想行动更多地受传统支配。他对建成兄弟的互不相容是了解的，而他采取的是保守“疗法”。他的愿望是各安其位，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儿子为争夺皇位而失去生命。考虑到建成是长子，而世民功大，权衡利弊得失，在谁为皇嗣问题上或许也犯过思量，甚至在建成有了过错时，更有过犹豫，一度产生过改立世民的念头，向世民有过表示。但他最终的决心还是维持建成的继承权。他的一个有利于世民的考虑是派李世民居洛阳，与

建成各守东、西两都。兄弟二人以陕分界，陕之西建成主之，陕之东世民主之。但连这也因建成、元吉的反对而“上意遂移，事复中止”。这显然是一个很拙劣的办法。这样做或许在高祖生前可免兄弟二人的纷争，却必然埋下将来分裂对峙的祸根。这件事表明目睹建成兄弟势同水火的局面，高祖实感无可奈何。在京城里处于劣势的秦王及其党属乐于如此，因为这可以摆脱朝廷控制，在东都发展势力，至少可以形成割据政权。而建成、元吉则担心秦王在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尾大不掉。一旦养虎遗患，将来就有被吃掉的可能。不管怎么说，高祖以建成为太子之意既决，发展下去，世民的处境就越来越不利。

双方都意识到可能有一天兄弟将兵戎相见，因此东宫和王府都拥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这不能不说是皇帝李渊的一个失误。在玄武门事变前，除王府兵之外，秦王还能另外集结八百壮士，而冯立等人能迅速召集东宫和齐府精兵两千人。说明他们拥有的公开和不公开的兵力都不小。这也是一个祸根。但就兵力来说，合东宫和齐府两支力量必然会超过秦府兵。

既然谋取皇位缺乏正当途径，既然两军对垒难以取胜，既然任事态发展等于坐以待毙，秦王便只能采取非常手段。这样做难免不为人诟病是弑兄逼

父，但总比束手就擒为人鱼肉的下场要好。

发动政变的决策是果断的。李世民在事变前夕似乎也有过犹豫，但那只是希望手下为政变再寻找一些堂而皇之的借口，把整个行动考虑得更周密而减少漏洞。整个事件的策划部署显然是十分周密的，一切后果都做了充分考虑。这不仅表现在由秦王劾奏太子和齐王，引蛇出洞，伏兵玄武门以守株待兔，而且进一步体现在杀了建成后如何处理跟皇帝李渊的关系。玄武门之变的最终目的是指向最高统治权的，事变后李渊既不能杀，也不能继续执政，因此只能采取既控制又利用的原则。玄武门伏杀建成、元吉得手，李世民立刻派猛将尉迟敬德以侍卫名义把李渊看管起来。从这时起，李渊便成了李世民的傀儡，李世民还要利用他导演皇位转移的末场戏。政变当日，高祖下令，一切军权交与秦王。

仅仅过了三天，便立世民为太子。并诏告天下，从此军队和国家的一切事务皆由太子处理，处理之后奏知皇帝。

又过了九天，李渊就表示退位，自己加尊号为太上皇。

两个月后，李渊下制传位于太子，李世民即位于东宫显德殿。

这一切都是按照李世民的意旨有计划地进行

的，李渊没有给他设置障碍，保证了旧朝向新朝的顺利过渡，李渊明智地退居二线。

这一年李世民二十九岁。这位年轻的天子，后人称为太宗。

第二年正月改年号为“贞观”，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李世民以非常手段取得帝位，唐人多所回护，后世多所褒贬。有人指责他“不顾亲”、“不知义”，说唐代“三纲不正，无君臣父子夫妇，盖其源出于太宗”。

这都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进行的批评，封建史学家把他发动玄武门之变视为“罪”和“恶”。但从政治角度评价太宗，几乎没有人认为由他做皇帝是不应该的。他的功业和才干都为李建成望尘莫及，按封建传统应该由建成做皇帝，但从治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李世民是比李建成更理想的皇帝。他所治理的贞观之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天下大治的时代。实践也证明了他即位为帝合乎历史发展的需要。中国历史从东汉末年以来，经历了长达四百多年的分裂战乱，至隋唐天下统一，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与四百年前的大汉王朝遥相辉映，历史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人物出现，只有伟大的人物才能使伟大的时代大放异彩，李世民是适应这伟大的时代出现的伟大人

物。即便秦王李世民未能取得帝位，那么历史和时代也会创造出另一个“李世民”来适应社会和时代的需要。太宗去世一百年后，诗人杜甫经过太宗昭陵，吟出“ 讖归龙凤姿，威定虎狼都 ”的诗句。后来杜甫又经昭陵，又吟道“ 草昧英雄起，讴歌历数归 ”。意思是说，英雄李世民在天下大乱的岁月出现，他消灭了各地争雄的群凶，命运所归，他就应该为社稷之主。杜甫的诗重复用了两个“ 归 ”字，充分强调了李世民即位称帝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

李世民“ 性刚烈 ”，与建成、元吉积怨既深，玄武门之变后，必欲斩草除根而后快。因此建成五子、元吉五子皆株连被杀，并绝其属籍，即取消其宗室身份。

秦府诸将迎合李世民的仇恨心理，主张把李建成和李元吉左右一百多僚属全部杀掉，抄没其家。李世民大概也有此意。只有尉迟敬德坚决反对。他认为，罪过在建成、元吉二人身上，现在他们都被杀，如果再株连其余党，涉及面很大，可能会造成很多人起而反抗，这是造成祸乱的根源，不是求安之计。《资治通鉴》记载敬德的态度，用了“ 固争 ”二字，说明李世民也倾向于诸将的意见，否则敬德就不必“ 固争 ”了。年轻气盛的世民一旦大权

在握，真想把东宫和齐王府为建成、元吉卖命的党徒杀个干净，一来消除后患，二来也出一出心中的闷气。他知道，在几年来和太子的明争暗斗中，就是这些人天天给太子、齐王出主意，几乎把自己送入死地。

一道赦令，避免了一百多人倒身血泊，也避免了由此而可能引起的不测事变。这实在是一个安慰人心和稳定局势的明智之举。建成、元吉虽死，但其余党不少，社会上存在着严重隐患。六月四日以后，直接参与玄武门之战的东宫、齐府将士不少逃亡隐匿，不少原东宫、齐府僚属也纷纷流窜各地；京城里尚有建成、元吉旧党，地方上也有不少支持建成、元吉的力量。李世民杀掉了建成、元吉，掌握了生杀予夺大权，那些支持和倾向于太子的宰相大臣也不能不心存畏惧。事变刚刚结束，他们都在观望形势，考虑自己的去就。这些人过去是敌对势力，如果现在采取高压政策，必然加强他们的敌对情绪。如果联合起来，就会形成新的威胁，局面就难以收拾。

稳定是事变后的最高原则，这一点还不能仅仅着眼于国内的局势。唐初，北方的突厥一直虎视眈眈地注意着中原地区的新兴政权，伺机进犯。八月丙辰日，正当唐王朝忙于处理政变后的事宜，紧锣密鼓地为新天子登基作安排时，一直在北部地区和

唐军交战的突厥突然遣使前来求和，如果联系到几天后突厥便进犯距长安仅七十里的高陵，可知所谓求和，实际是借机窥探唐朝廷的动静。果然，癸亥，李渊传位给世民；癸未，突厥颉利可汗便亲自率军进至渭水便桥之北。正如李世民所分析的，突厥所以敢举全国之众而来，直抵长安近郊，因为我们国内刚发生玄武门之变，新天子刚刚即位，他们以为唐朝一定不敢与之对抗。大敌当前，如果不能妥善处理玄武门之变后的遗留问题，特别是建成、元吉的余党问题，造成内乱，必然会给突厥造成可乘之机。

要消除建成、元吉余党的敌对情绪，争取敌对势力的倒戈，清除一切隐患，避免社会震荡，仅仅一道敕令还不足以安定人心，鼓舞情绪。“六四”以后，李世民采取了一系列稳妥而积极的措施以稳定局势。其中最重要的有下述几项：

首先，赦免六四事件中参与血战的东宫、齐王府将士。

玄武门事变中，建成的部将冯立听到建成被杀的消息，说：“哪里有主人活着享受其恩惠，而主人遭难却远远逃避的呢？我不能忘恩负义。”可见他是一位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报答建成的死党。他与谢叔方、薛万彻率宫府兵猛攻玄武门，血战中，他们杀死了支持秦王的敬君弘、吕世衡。薛万彻鼓

噪要杀向秦府，曾使秦王将士胆战心惊。事变后他们都逃匿不出。这些欠着秦王将士血债的人本来是最难得到宽恕的，同时也是最容易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的，但都在朝廷赦免之列。他们看到赦令，纷纷出来自首。冯立、谢叔方自动归款。薛万彻藏在终南山中，心存疑虑，太宗多次派人向他讲明政策和态度，最后也回到长安。李世民知道这些人都重然诺，讲义气，应该攻心为上。因此，见到他们，总是首先严厉斥责其助太子为“恶”之罪，把兄弟相残的责任归结为他们的离间骨肉。等到他们表示认罪，便转怒为喜，又褒扬他们忠于主子的义士行为，原谅他们的过去。最后任命新的官职，令他们心服口服，感恩戴德，乐于效命。冯立就感激地说：“遭蒙不杀之恩，侥幸免于死罪，此生此世，一定以死报答。”

当时，建成、元吉之党散亡民间，虽然朝廷屡下赦令，仍不自安。不久又发生了李瑗之乱。李瑗为幽州大都督，是李建成安插在地方上的一个死党，建成死后在幽州举兵作乱被杀。地方上人们纷纷告发和捕捉与建成、李瑗有牵连的人，以邀功请赏。太宗接受了王珪的建议，下令：“六月四日以前事连东宫及齐王，十七日前连李瑗者，并不得相告言，违者反坐。”坚决制止此类事发生。

其次，捐弃前嫌，任用东宫旧僚。

魏徵原来在东宫任太子洗马，这是侍奉太子并为东宫掌管经史图籍的官职。武德年间，他多次劝建成采取果断措施，及早除掉秦王，以绝后患。他为建成巩固太子地位费尽心机，因此最为秦王痛恨。玄武门事变后，东宫余党纷纷逃亡，魏徵端然未动。太宗召见魏徵，正颜厉色地责问：“那时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左右官员都替魏徵捏一把汗。魏徵却举止自若，说：“先太子如果听从我的话，一定不会遭到这场杀身之祸。”言外之意，玄武门之变并不代表你和我的谁胜谁负，建成采纳了我的建议的话，你秦王不会有今天。魏徵坦然承认事实、不委曲求全的姿态和口气，使太宗很感意外；魏徵的话也提醒太宗，这确实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

他平时就对魏徵的才干深加赞佩，此时立刻收敛了满面怒容，含笑相对，请魏徵入座，任命他为詹事主簿，这是太子詹事府掌文书、印检、纸笔之事的官职。这件事表明，太宗不仅能接受那些迫于威势请罪认罪的人，而且对于那些有才干的人，哪怕桀傲不驯，也不愿交臂失之。数年后，太宗忆及此事，还说：“过去魏徵确是我的仇人，但他尽心于所辅助的人，有很值得称赏的品格。”表现了他对魏徵效力于建成的谅解。

王珪、韦挺都是建成的亲信。当建成为世子